

季旭升教授著《诗经古义新证》是一部在台湾和大陆都引起注意和好评的《诗经》研究专著。

两年多以前，我与向熹等友人讨论《诗经》训诂问题，曾经谈到近二十年新的《诗经》注释或注译出版几十种之多，训诂大都陈陈相因。一些年轻的学者认为，从古到今，历代《诗经》注疏多得很，诸家无异义的可以照抄，有歧义的就择善而从，所以《诗经》注译人人可做。我们认为，承袭定说和择善而从，当然不是不可以，但是这样下去，没有学术的发展和新突破，学术不能进步，又如何显示我们时代学术研究的水平呢？去年，向熹教授来信称赞季旭升教授的《诗经古义新证》，提出这是一部下了真功夫的研究《诗经》训诂的新著，这部台湾同行认真治学的新成绩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和总结。向熹教授是当前中国大陆精研《诗经》语言的名家，季旭升教授是我认识的台湾朋友中勤奋治学的中年学者之一，于是，我抱著学习的态度，

《诗经》是我国最早的文学总集，关关雎鸠、依依杨柳，三千年来，不知倾倒了多少善感而细腻的心灵。《文心雕龙·宗经》篇说：「《诗》之言志，诂训同书，摘凤裁兴，藻辞谲喻，温柔在诵，故最附深衷矣！」说的真是一点也不错。

但是，这么一部人人喜爱的好书，却是异说最多、最难通读的一部先秦典籍。皮锡瑞《经学通论》「论《诗》」比他经尤难明，其难明者有八」条说：

《詩》為人人童而習之之經，而《詩》比他經尤難明，其所以難明者：《詩》本諷喻，非同質言，前人既不質言，後人何從推測？就《詩》而論，有作詩之意、有賦詩之意，……此《詩》之難明者，一也。漢初傳經，皆止一家，……惟《詩》三家，同為今章，所出各異，當時必應分立，後人不可併為一談。而三家久亡，大義茫昧。此《詩》之難明者，二也。三家亡而毛《傳》孤行，義亦簡略，……後儒作疏，必欲求詳，毛所不言，多以意測，……。軌途既別，濟今無由。此《詩》之難明者，三也。鄭君作《箋》，雜揉今古，難盡剖析源流。此詩之難明者，四也。他經之疏，專主一家，惟《詩》毛、鄭並行，……既分門

詩經古義新證

季旭昇◎著

1207.22
424

本書榮獲 1999 年中國詩經學會第一屆
中青年優秀研究成果評獎第一等第一名

鄧析古義經解

季旭昇 著

學苑出版社

評《詩經古義新證》——代序

夏傳才

季旭升教授著《詩經古義新證》是一部在台灣和大陸都引起注意和好評的《詩經》研究專著。

兩年多以前，我與向熹等友人討論《詩經》訓詁問題，曾經談到近二十年新的《詩經》注釋或注譯出版幾十種之多，訓詁大都陳陳相因。一些年輕的學者認為，從古到今，歷代《詩經》注疏多得很，諸家無異義的可以照抄，有歧義的就擇善而從，所以《詩經》注譯人人可做。我們認為，承襲定說和擇善而從，當然不是不可以，但是這樣下去，沒有學術的發展和新突破，學術不能進步，又如何顯示我們時代學術研究的水平呢？去年，向熹教授來信稱贊季旭升教授的《詩經古義新證》，提出這是一部下了真功夫的研究《詩經》訓詁的新著，這部台灣同行認真治學的新成績，特別值得我們注意和總結。向熹教授是當前中國大陸精研《詩經》語言的名家，季旭升教授是我認識的台灣朋友中勤奮治學的中年學者之一，於是，我抱著學習的態度，

認真地讀了這部厚達 435 頁的專著（台北版），並願意把我的學習心得提出來與同行們討論。

《詩經》是一部字句、義旨異說最多的先秦典籍，原來記錄上古語言的上古文字、到漢代已經發生重大變化，加以異文、闕訛、假借，其語言文字，漢人已不能全懂。各篇詩的意義，從詩篇創作到代代說解，有古義、旁義、附會引申之義，或曰作詩之義和用詩之義，加上漢學各派師法門戶，傳授不同，所以異說最多。根據這個實際情況，《詩經》學不能不以訓詁注疏為主要內容，兩千多年都如此。到現代，這個工作還沒有做完。正象一位詩人寫的诗：「千古《詩經》真個費思量！皓首切磋風雅頌，抒己見，贊炎黃。」¹

《毛傳》、《鄭箋》是有成績的，基本上反映了两漢《詩經》訓詁義疏研究的成果。它們的貢獻是讓我們把《詩經》通讀下來。可是，它們只是這個工作的第一階段的總結，還有許多闕疑和講錯了的地方。經過魏晉六朝和隋唐之際學者几百年的繼續探討、爭辯，異說歧異之多，使學者無所依傍，唐代不得不組織大批學者來搞「正義」，產生了我們簡稱為《孔疏》的這部集漢學訓詁義疏之大成的《毛詩正義》。《孔疏》也只能代表那個時代的學術水平，宋學家以「求真求實」的精神繼續研究，就發現漢學家訓詁義疏的許多錯誤和遺漏。從總體來看，集宋學訓詁義疏之大成的朱熹《詩集傳》，較前人有所進步，有所提高，而博學覃思如朱老夫子這樣的國學大師，也不得不在書中的許多地方寫上「此句不得解」；他已經解釋的也仍有訛誤和可疑之處。《詩集傳》通行了几百年，清朝人才公開批

¹ 蕭甫春詞〈江城子〉，《中國詩經學會會務通訊》第8期。

评其中的错误。清代学术兴盛，学者很会做学问，他们吃穿不愁，有时间、有精力，可以几十年如一日专心致志钻研他们的课题。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，尤其在小学方面，有其严谨的科学性，产生了几部很有价值的《诗经》注疏的煌煌巨制，不乏超越前人的名著。但是，到方玉润撰《诗经原始》时，他仍然为异说纷繁而叹息「二千馀年纷纷无定解」。当然不是这些大师学识不博、用功不勤，而是因为他们只能达到他们各自时代语言文字学、考古学、历史科学、文艺学以及整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所能达到的总体水平。

清代后期的皮锡瑞著作中有〈论诗比他经难明者有八〉一节²，他提出了八条理由；季旭升教授在他这部书的〈序〉里又补充了四条理由；民国初年国学大师王国维也在〈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〉中提出，他于《诗》所不能解者有十之一二，并且说：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，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，然其说终不可通，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。」他也提出难解的三条理由。八条也好，四条也好，三条也好，古人所不得确解的原因，归纳起来，不外是受到三个方面的制约：

1. 《诗》以上古语言为载体，以上古文字记录，直接关系上古汉语、古文字学、古音韵学以及假借、异文校勘、名物制度等等的考据和研究，因而不得不受到这些学科各个时代研究水平的制约；
2. 《诗》是文学作品，关系到文艺美学以及比兴、象征、谐隐、修辞、韵律等艺术方法，受到各个时代文艺科学研究水平的制约；

² 皮锡瑞《经学通论》。

3. 《詩》是周代社會生活的反映，對它的內容的準確闡釋，關係到周代歷史、社會形態、典章制度、民俗風習以及社會學、神話學、民族學等等文化人類學的內容，必然受到歷史科學、考古學及上述相關學科研究水平的制約。

在以上這些都很重要的條件之中，我認為正確理解《詩經》的文句，是第一條，只有準確地把握了文句的意義，各種說解才有切切實實的基础。「確詁」，應該是我們努力以求的首要工作。《詩經》訓詁，前人已經做了兩千多年，我們對前人的訓詁應持什麼態度呢？七十年代，我曾經在《詩經研究史概要》寫過這樣一段話：

舊有箋疏是前人給我們留下的一份重要貢獻，沒有前人對於文句字詞的注釋，我們今天閱覽《詩經》還要困難萬倍。但是兩千年間，《詩經》的注釋極多，各家注疏歧義互出，一字一句的解釋，有時有多種甚至十幾種，因而一句一章意義的分歧也就很大。……我們的態度應該是既不抹殺古人，又不迷信古人，盡可能多參考自漢以來的各種舊解，加以審慎的抉擇或成建立新說。

3

在歷代舊說中，古說是應該特別注意的，因為越古，越距《詩經》時代近，可能就是原意或接近原意。以《毛傳》為例，它的訓釋大部分是正確的，經過我們研究比較，《鄭箋》改《毛傳》的地方，常常是改錯了。《毛傳》的訓釋有些是從先秦傳下來的，其中有些可能就是詩篇創作時代的解釋。我們在檢驗舊注時要重視古義，持「信古而不泥古」的原則。

³ 《詩經研究史概要》第一章，萬卷樓圖書公司，1993。

季旭升教授的《诗经古义新证》正是持这个原则的著作。书名以「古义」为题，就是重视古义来辩证其正讹，如〈序〉中说，「旨在求真求实，而不是有意求新求异」。他还说：

清代學術昌明，超邁前代，學者研究《詩經》，不管是謹守毛《傳》的也好，博采諸家的也好，大都考證精詳，義不苟發。文字、聲韻、訓詁的驚人成就不用說了，在禮樂典章、名物制度、古代史地、天文歷算等各方而，都有令人嘆為觀止的成就。……如以文獻為範圍的考據而言，大概可以做的部分，被清人做完了，後人幾乎不可能再從文獻上做出超越清人的考據成績。

季旭升教授的这个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，既然我们已经「几乎不可能再从文献上做出超越清人的考据成绩」，那么，我们继续研究《诗经》，去解决前人包括清人在内的学者所没有解决的问题，去检验他们所研究的结论，就不能不采用新的方法，开辟新的蹊径。季旭升教授找到了新的方法和蹊径，这就是综合运用古文字学和现代考古学的丰富的成就，即援用已积累了四千多字的金文和大量甲骨文的现代研究成果，援用过去和现代陆续出土的考古发现，结合大量的先秦文献，对一些有疑义的古义进行考辨。

当然，援用金、石、甲骨文来考证古籍过去也有人做。宋代已经有人援用金石文字来考证经史，清代乾嘉时期戴震、马瑞辰的《诗经》学名著都利用金石文字于训诂。那个时期，金石文字资料没有现在丰富，金石学尚处于初期阶段。甲骨文是在十九世纪末才大批发现，本世纪初才开始有甲骨之学，王国维就是援用甲骨文研究《诗经》的早

期代表人物。

援用金、石、甲骨等古文字学考证《诗经》中的古义，是《诗经》学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。这个问题，要从「五四」时期现代《诗经》学的建设说起。

「五四」时代是中国社会，也是中国学术文化大变革的时期，在科学、民主的时代大潮之中，掀起了扫荡封建旧文化的狂飙。在《诗经》研究领域，「五四」新文化的先驱者们，把《诗序》视为《诗经》封建义疏的中心，掀起比宋人反《诗序》还要声势浩大的废《序》运动。他们把《诗序》批得很臭很坏，一无是处，《诗序》所赖以依托，或由《诗序》所派生的旧注旧疏，自然都在摒弃之列。于是，重新注解《诗经》便成为时代的要求。胡适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，他在1925年提出重新整理国故的时候，对于整理研究《诗经》，他曾经提出这样的指导性意见：

研究《诗经》大约不外下面两条路：

〔第一〕训诂 用小心的精密的科学的方法，去做一番新的训诂工夫，对于《诗经》的文字和文法上都重新注解。

〔第二〕题解 大胆地推翻二千年积下来的附会的见解，完全用社会学的、历史的、文学的眼光，重新给每首诗下个解释。

所以我们研究《诗经》，关于一字一句，都要用小心地科学方法去研究，关于一首诗的用意，要大胆地推翻前

人的附會，自己有一種新的見解。⁴

胡先生在这里明确地提出要建立现代诗经学，去完成《诗经》新的训诂义疏。但是，如何具体地去实行呢？胡先生自己的做法却不高明。可能因为他不以《诗经》学为治学方向，也不精于语言文字学，也不看前人的注疏，并不去一字一句地求证求实，多凭一时的感悟而作出新解。如他解释〈葛覃〉是女工放假要回家，〈小星〉是描写妓女生活等等，其实，只要认真地看看旧注，考虑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，就不会闹出这样的笑话。可见一无依傍是不行的。前人的注说并不全是错的，还有许多正确的可取的东西。

梁启超先生曾经大力推许称之为「独立思考派」的姚际恒、崔述、方玉润三家，基本用意是提倡以「玩味诗文」为主，对旧注从其是而黜其非。这个主张对现代《诗经》学者，从「五四」时期到现在，都有深刻的影响，即从诗篇本身的文字去体会诗篇所表达的意思，如旭升教授所说的「对古训既不过度尊崇，盲目接受；也不过度排斥，一概抹煞」，而是「择善而从」。那么，如何「择善而从」呢？或从或黜有什么依据？怎样「玩味诗文」？如果完全照孟子说的「以意逆志」，即以己之意，逆诗人之志，由于「玩味」者的思想、感情、学术资质、艺术修养有所差异，就难免言人人殊，漫无准的。胡先生闹过的笑话是这样，大陆前些年盛行的「新经学」也是这样。接受美学理论只是艺术鉴赏论，不是「求真求实」的学术研究。「求真求实」的学术研究是认识事物的本来面貌，对《诗经》来说，就是研求字句的本义和全篇的本义。由此可见，「玩味诗文」这个读《诗》方法要做好，必须以正确地阐释文

⁴ 《國學季刊發刊詞》。

本为前提。

如何辨析古义旧注的是非，如何通过考证来正确阐释《诗经》文本的那些古老字词呢？在古文献范围内可以做的考证研究，既然已经基本上被清人做完，我们就只有从新的角度，用新的方法和新的材料，才可能有新的创造。所以在王国维、罗振玉等之后，一批学者继承他们的衣钵，随著金石之学、甲骨学的逐步进展，援用金、石、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古代经史。其中用于研究《诗经》的专著，有林义光的《诗经新义》，还有郭沫若、徐中舒、唐兰等的论文。其中，成绩最大，在《诗经》研究领域开一代风气的，当首推闻一多。

我曾经提出闻一多开创了《诗经》新训诂学，把季旭升教授的《诗经古义新证》定位为闻氏《诗经》新训诂学的继承和发展，这就有必要把闻氏训诂学的方法论简要地介绍如下：

- (1) 他继承了乾嘉学派从古文献中广征博引、精密求证的科学方法，结合现代语言学理论（概念和逻辑论证），援用他那个时代古文字学（金文、甲骨文）资料，从《诗经》字词入手，进行了新的训诂和说解，有所前进，有所发现。
- (2) 他把《诗经》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，运用文艺美学、文艺心理学和现代文学理论来阐释，充分注意到诗篇的文学特点以及比兴、象征、谐隐、修辞以及韵律等艺术技巧，因此，他对民歌和抒情诗的注释和说解超越了前人。
- (3) 他综合运用了历史学、社会学、民俗学、考古学以

及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和方法，他的眼界较前人大为开闢。

因此，闻氏的训诂和说解，其内涵已经大大不同于传统的《诗经》学。尽管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见解有误，毕竟是较前人进步，重要的是他的研究方法具有新的方法论的意义，所以开启了一代学风，在欧、美、日本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，例如日本研究《诗经》的名家白川静，不但受到法国葛兰吉的影响，也接受了闻一多的影响。

任何一位开创新风的大师，失误是虽免的。在闻一多的时代，金文资料不如现在丰富，甲骨学远处于初创阶段，人们能够准确辨识的这些古文字并不多，因此某些古文字认错了，是不可避免的。那时，哪位专家把当时的金文、甲骨文都认识准确了？加上那时考古学、历史科学的资料和总体理论水平，闻氏本人又英年早逝，博学、睿智如闻氏，不能不受到这些客观条件的限制，在具体问题产生某些误解。当然，闻氏的失误还在于他接受过弗洛伊德学说的消极影响，强调所谓「性张力」的作用，写过《诗经的性欲观》以及解释情诗、民歌时较多扯到「性」。再有，他过多地以「假借」为由改变原文以强合己说，这不够慎重。这些失误，是探索者的失误。我们既允许科学实验可以有上千次的失误，为什么不能宽容学术探索有几次失误呢？对于前贤，我们应该著重看他在学术上的贡献，不必求全责备。

五十年代以后，有许多学者继续闻一多的学术道路，但大多是在文艺美学、社会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方面，对闻氏的方法论有所借鉴。援用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的新成果，从文字训诂、名物制度考证入手来考证古义，只零零碎碎

见到一点，未成气候。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，「新经学」处于统治地位，万马齐喑，尽管出土资料日益增多，古文字学有所进展，却见不到做这个工作的成果。但在闻一多的方法论中，援用古文字学和考古学资料考证《诗经》的文句和古义，恰恰是不宜缺少的部分。

八十年代以来学术新生，《诗经》研究继续发展。八十年代的文艺美学的、民俗学的、语言学的以及《诗经》学史的研究多。九十年代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多，鉴赏多，古文字学、考古学的研究仍不多见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做很难，需要扎扎实实的长期努力，雄厚渊厚的知识，尤其是古文字学的较深厚的功底。

季旭升教授是具备这些条件的学者，从读研究生时代起，锲而不舍地钻研古文字学十五年，著有《甲骨文字根研究》，合编《金文字形编》、《青铜器铭文检索》，将目前所能见到的八千馀件铜器上的铭文全部录下来，并且用楷书写出来。他也留意大陆出土资料，来大陆参加有关学术会议。由于这样的长期积累和不断获得新的信息，使他能够以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的较深厚的功力，在当代《诗经》研究中，继承并且发展了闻一多创始的《诗经》新训诂学。

说季旭升教授继承了闻氏的《诗经》训诂学，主要是指上面提到的闻氏方法论的第一个方面，即把朴学从古文献中广征博引、精密求证的方法，与现代语言学的概念和逻辑推理相结合，以古文字学和考古学为主导，仔细而条理分明地来考证字句的古义，求得确解。如他所抱的宗旨，在于「求真求实」，而不勉强去「求新求异」。他考证的范围很广，有名物、制度、史地、风习、人物、动词、形

容词、虚词以及句意，经过他的精心考证，使某些历来有歧义的字句得到通解，使传统的误释得到纠正，或者证明在过去的歧义中哪一个是正确的，这都有助于正确理解文本。本书的序言中，作者已经写出了这二十三篇考证文章的简明提要，无须我再抄录了。

说他又发展了闻氏的新训诂学，理由是他利用了比闻氏时代内容要丰富、辨识更趋精确的古文字学，他对古文献的征引、现代语言学概念和逻辑推论也较趋精密化。尤其是他旨在「求真求实」，并不「求新求异」，常常证明古义是正确或接近正确的。他尊重文本，不轻易言假借，也扬弃了闻氏所受到的弗洛伊德「性张力」学说的影响，从而使他的训诂方法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。

季旭升教授的这部著作，也注意到《诗经》的文学性质，在文句考证中考虑到诗歌创作的修辞、隐喻和声韵的转换等艺术技巧。当文句考证必须结合诗义阐释时，他也分析到诗篇的比兴、象征及抒情方式。从训释文学作品的字词来看，这样做是必要的。因为本书的任务不重在文学阐释，不作篇章鉴赏，我们不能提出这方面更高的要求。

在本书二十三篇的全部考证过程中，已经关系到典章制度、史事、历史地理、民俗风习、著者都有考证和阐释，只是它们和当前专门从事《诗经》文化人类学的论著表现形式、内容侧重有所不同。这是由本书的内容和重点决定的。著者并不排斥这些学科的成果，但在本书中只能有限度地接触到这些方面的内容。

当然，就对《诗经》总体研究而言，闻一多方法论的三个组成部分不宜偏废，具体到某一个具体问题，一本书，一篇文章，不妨只解决一个或一个方面的问题。

我与友人们所以这样推许季旭升的这部专著，并不等于说这部书中每一条考证、每一个说解都准确无误。百分之百的准确无误，在学术史上还是很少见的。一种新说要得到学术界的认同，要经过一段检验乃至辨难的认识过程。我们重视的是季旭升教授的这部专著的方法论上的意义，希望推广开来，把闻一多创始的《诗经》新训诂学更加健康地发展，向前推进。

北京有一位扬之水（赵永晖）女士，也是潜心精研《诗经》训诂和考证的。她主要是通过词语、名物的考证诠释章句和重新阐释诗义。近两年连续发表几篇文章，有较好的成绩，在学术界崭露头角。她的方法和成绩，当另文讨论。这里所以提出来，是说她方近中年，季旭升教授也正在中年，他们能够潜下心来，从事这样艰苦、繁重的考证研究，正是「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」，这一代人是有希望的，中国学术是有希望的！

以上只是我个人学习《诗经古义新证》的心得和一些感想，拉拉杂杂，说错的地方请大家指正。

1997年12月18日於思無邪齋
本文刊登於台北《漢學研究》6卷1期，1998年6月

《詩經古義新證》自序

《詩經》是我國最早的文學總集，關關雎鳩、依依楊柳，三千年来，不知傾倒了多少善感而細膩的心靈。《文心雕龍·宗經》篇說：「《詩》之言志，詒訓同書，摛風裁興，藻辭譎喻，溫柔在誦，故最附深衷矣！」說的真是一點也不錯。

但是，這麼一部人人喜愛的好書，却是異說最多、最難通讀的一部先秦典籍。皮錫瑞《經學通論》「論《詩》」比他經尤難明，其難明者有八」條說：

《詩》為人人童而習之之經，而《詩》比他經尤難明，其所以難明者：《詩》本諷喻，非同質言，前人既不質言，後人何從推測？就《詩》而論，有作詩之意、有賦詩之意，……此《詩》之難明者，一也。漢初傳經，皆止一家，……惟《詩》三家，同為今文，所出各異，當時必應分立，後人不可併為一談。而專家久亡，大義茫昧。此《詩》之難明者，二也。三家亡而毛《傳》孤行，義亦簡略，……後儒作疏，必欲求詳，毛所不言，多以意測，……。軌途既別，溝合無由。此《詩》之難明者，三也。鄭君作《箋》，雜揉今古，難盡剖析源流。此詩之難明者，四也。他經之疏，專主一家，惟《詩》毛、鄭並行，……既分門

戶，未易折衷。此《詩》之難明者，五也。歐陽修《詩本義》始不專主毛鄭，宋人競立新說，至朱子集其成，元明一概尊從，近人一概抹殺。……漢宋強爭，今古莫辨。此《詩》之難明者，六也。宋人疑經，至王柏而猖狂已極，妄刪國風，進退孔子。國初崇尚古學，陳啟源等仍主毛《詩》，……然毛所不言者，不能不補以《箋》、《疏》，或且強韓同毛。乾嘉崇尚今文，……然止能搜求斷簡，未能解釋全經。毛既簡略不詳，三家尤叢殘難拾，……此《詩》之難明者，七也。三家《序》亡，獨存毛《序》，然《序》亦不盡出毛公，……近人申毛者以《序》、《傳》為一人所作，然《序》實有不可盡信者，與馬、鄭古文《書序》同。究竟源自西河，抑或出於東海？此《詩》之難明者，八也。

象皮錫瑞這種幼而習經、畢生钻研的學者，都會認為《詩經》比他經尤難明，《詩經》之難明，可以想見。除了皮氏所舉的八點之外，《詩經》之難明，其實還有以下數種：

一是古學難明。《詩經》一書，包羅萬有，上自天文，下至地理，迩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，還有草木鳥獸、花果蟲魚。大到治國典章、五禮六官；小到車馬服飾、飲食男女，都和詩義的了解關係密切，其中只要稍有隔閡，可能就對詩義產生非常嚴重的誤解。如《周南·關雎》，有人以為是詠閭巷男女由自由戀愛終而結婚的詩篇，殊不知周代「昏禮不用樂」，明見於《禮記·郊特牲》；而閭巷男女，不要說沒有資格擁有鐘鼓，恐怕連用音樂的權利都沒有，「禮不下庶人」，明見於《禮記·曲禮》。如果明白了這些背景知識，那麼《詩經》簡直無從讀起，而要具備這些知識，又不是三、五年所能獲得的。

一是文字難明。《詩經》是周代初年到春秋時期的作

品，一方面起源相当早，因此诗中所用的字往往可能保留了早期的本义，而后代已经完全不用这个本义，甚至于完全不知道有这个本义，如《小雅·棠棣》的「棠棣之华，鄂不韡韡」，郑《笺》释「不」为「鄂足」，这个解释不见于先秦其他任何典籍，但现在的古文字学者从甲骨文「不」字来看，大都同意郑玄的讲法是可信的（于省吾先生《泽螺居诗经新证·卷中》第109页不同意郑说，但于说似乎不见得比郑说好）。

又如「以」字的本义是象人手提挈形，因此「以」字有「提携」、「带领」的意思，《豳风·九罍》「无「以」我公归兮」便是说「不要带著我们敬爱的周公回去吧」。徐中舒先生不知道这一层意义，把「无以我公归兮」，看成跟「公归无所」、「公归不复」同义，于是说这一首诗是写鲁昭公失国，图谋归国复位的史事，错得非常离谱（参本书《〈诗经〉「以」字古义新证》条）。另一方面是《诗经》向下延伸的时间也相当长，除了《诗经》中有春秋时代的作品，其用字当与西周初已有不同外，在《诗经》流传的过程中，因为口耳相传、载于竹帛的同音笔误有之；因为汉人看不懂先秦的古文，因而导致误会者有之。例如《召南·甘棠》篇「勿剪勿拜」字，郑《笺》说：「拜之言拔也。」「拜」为什么会有拔的意思？过去的学者都很疑惑，直到吴大澂、郭沫若、龙宇纯先生才把这中间的道理弄清楚了。原来「拜」字原本应作「揜」，从手从丰，象以手拔草根之义。到秦汉时期，「揜」的字形隶化成「拜」，因此「拜」、「揜」本来就是同一个字。但是因为铜器中「拜頤首」的「拜」都假借这个拔草的「揜」字，久假不归之后，人们只好造另一个形声字「拔」来记录拔草根的意义。汉代写定《诗经》的时候很自然地就把《甘棠》诗中的「揜」字写成「拜」了。再到后来，一般人只知道